

● 古代文学

# 清代文化政策对八股文衡文标准的影响

高明扬<sup>1</sup>, 蒋金星<sup>2</sup>

(1. 浙江大学 人文学院, 浙江 杭州 310028; 2. 湘潭大学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湖南 湘潭 411105)

[作者简介] 高明扬(1970-), 男, 土家族, 湖北恩施人, 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古籍研究所博士生, 主要从事明清科举制度的研究; 蒋金星(1968-), 男, 湖南邵阳人, 博士, 湘潭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讲师, 主要从事明清科举制度的研究。

[摘要] “清真雅正”是清代科举八股文的衡文标准。“清真”主要针对理而言, “雅正”针对辞而言。此标准机械而灵活, 且具有相当的黜落功能。这一标准有关文风, 但它的确立非全因文体发展的内在客观要求而定。它是清初统治者鉴于明末制艺流弊, 为配合文化政策的实施而提出的, 反映了官方的人才价值取向。这一标准到乾隆时被确定下来, 并为满清后来各王朝沿袭并得到强化。

[关键词] 八股文; 衡文标准; 清真雅正; 文化政策

[中图分类号] I206.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881X(2005)04-0480-06

清代科举取士和学校考试沿袭明代旧制, 以八股文作为考试的主要文体。从童生入学考试到殿试之前, 即县、府、院试, 乡试, 会试, 以及生员的拔取贡生考试都需要考八股文。国家通过考八股文遴选行政官吏人才。在某种意义上, 政府选拔人才的标准就是衡文的标准。衡文标准在八股取士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 它为封建最高统治者皇帝所关注, 且直接关涉到统治者选拔何种统治人才的问题, 也反映统治者对人才的价值取向。这一标准的确立, 非全因文体发展的内在要求而定, 它同时也和统治阶级的文化政策紧密相连, 在很大程度上是受了整体文化政策的影响。

## 一

在分析文化政策对衡文标准确立的影响之前, 我们有必要弄清何为有清一代八股文的衡文标准, 以及这一标准的具体含义。《清史稿·选举三》“文科”条记载: “世宗屡以‘清真雅正’告诫试官。乾隆元年(1736年), 高宗诏曰: ‘国家以经义取士, 将以覘士子学力之浅深, 器识之淳薄。……当明示以准的, 使士子晓然知所别择’。”<sup>[1]</sup> (第3153页) 《选举志》记载的“清真雅正”这一概念, 在雍正十年(1732年)的谕中就已明确表明, “近科以来, 文风亦觉丕变, 但士子逞其才气辞华, 不免有冗长浮靡之习, 是以特颁此旨, 晓谕考官, 所拔之文, 务令‘清真雅正, 理法兼备’, 虽尺幅不拘一律, 而枝蔓浮夸之言, 所当屏去”<sup>[2]</sup> (第1649页)。乾隆十年(1745年)谕云: “国家设制科取士, 首重四书文, 盖以六经精微, 尽于《四子书》。设非读书穷理, 笃志潜心, 而欲握管挥毫, 发先圣之意蕴, 不大相径庭耶? 我皇考有‘清真雅正’之训。朕题贡院诗云‘言孔孟言大是难’, 乃古今之通论, 非一人之臆说也。”<sup>[2]</sup> (第1659页) 梁章钜在《制义丛话》中说: “‘清真雅正’四字, 代圣贤立言者非此不可, 宜乎圣训相承, 规重矩袭, 永为艺林矩矱, 制艺之准绳矣。”由以上不胜其烦的引用, 我们可以看出: “清真雅正”是清统治者法定的八股文评判标准。这样, 在

八股取士中,士子应试写作就晓然知所别择,试官衡文判卷亦知衡文之正鹄。值得注意的是,这里所说的衡文标准是关涉文风的,如雍正所言,“近科以来,文风亦觉丕变,……所拔之文,务令‘清真雅正’”<sup>[2]</sup>(第1649页)。可见,各种禁条和基本格式就不包括在内了。

何为“清真雅正”的科考文章?《青照堂丛书·四书文法摘要》谓:“国朝定文品四字:清真雅正。清有四:意清,辞清,气清,要在心清;真有五:题中理真,题外理真,当身体验则真,推之世情物理则真,提空议论则真;雅有二:自经书出则雅,识见超则雅;正有二:守题之正,变不失常。”这已全面概括了“清正雅正”对文章的要求。方苞在《钦定四书文·凡例》中就选录“四书文”的标准说:“凡所录取,皆以发明义理,清真古雅,言必有物为宗。”并进一步解释说:“唐臣韩愈有言:‘文无难易,惟其是耳’;李翱又云:‘创意造言,各不相师而其归则一’,即愈所谓是也。文之清真者,惟其理之是而已,即翱之所谓创意也。文之古雅者,惟其辞之是而已,即翱之所谓造言也。而依于理以达其词者,则存乎气。气也者,各称其资材而视所学之浅深以为充歉者也。”他还指出“清真古雅”的文章对理、辞、气的要求:“欲理之明,必溯源六经而切究乎宋元诸儒之说;欲辞之当,必贴合题义而取材于三代、两汉之书;欲气之昌,必以义理洒濯其心,而沉潜反复于周秦盛汉唐宋大家之古文。兼是三者,然后能清真古雅而言皆有物。故凡用意险仄纤巧而于大义无所开通,敷辞割裂卤莽而于本文不相切,比及驱驾气势而无真气者,虽旧号名篇,概置不录。”

方苞还在《礼闈示贡士》一文中更明确地阐释了“清真古雅”的内涵及其对时文的要求:

然清非浅薄之谓,五经之文精深博奥,津润辉光,而清莫过焉。真非直率之谓,左、马之文怪奇雄肆,浓郁斑斓,而真莫过焉。欧、苏、曾、王之文,无艰词无奥句,而不害其为古。管夷吾、荀卿、《国语》、《国策》之文,道琐事,述鄙情,而不害其为雅。至于质实而言有物,则必智识之高明,见闻之广博,胸期之阔大,实有见于义理而后能庶几焉,是又清真古雅之根源也。时文之为术虽浅,而其从入之径途、用功之冒级莫不然,必于义理洞彻无翳而后能清,非然,则理无发明,为浅为薄而已矣。必于题切中而后能真,非然,则为循题敷衍,为直为率而已矣。必高挹群言,炼气取神而后能古雅,非然,则琢雕字句,为涩为赘,为剽为驳而已矣。必贯穿经史,包罗古今,周察事情,明体达用,然后能质实而言有物,非然,则剿说雷同,肤庸鄙俗而不可近矣。

此话可谓道尽了“清真古雅”的实质。按《四书文法摘要》及方苞所言,八股文“清真雅正”当理解为:“清”要求文章所阐发的义理清楚明白,一目了然,不能含糊。文章文辞要清新自然、朴实。文章条理清晰,文气自然流畅。“真”即文章阐发的义理要真实,切合文题,符合经书义理,不矫揉造作,要符合人情事理。“雅”是文辞要用经书语言,要以《左传》、《史记》、唐宋八大家文等为文章语言的典范,文中的见识要超出鄙俗肤庸,有所发明,不人云亦云。“正”是最高境界,文章只有达到了这些要求,才符合统治者所要求的正统。

乾隆三年(1738年)的谕旨对此要求作了明确说明:“凡岁科两试以及乡会衡文,务取‘清真雅正’,法不诡于先型,辞不背于经义者,拟置前茅,以为多士程式。如有好为怪异,于题意毫无发明,但抄录子书中人不经见之语,以妄希诡遇者,概置勿录。”<sup>[2]</sup>(第2113页)由此观之,与“清真雅正”相背离的就是法诡于先型,辞背于经义,题意无发明,好为怪异,陈词烂语,这样的文章不符合国家选士的标准,必遭黜落。很显然,“清真雅正”的八股文章是要用简洁、典雅的语言阐述士子所领悟的孔孟之道、程朱之学。

我们在翻阅清代硃卷时发现,以上所说的这些并非虚妄之语。道光庚子科朱时中会试硃卷,《用下敬上谓之贵贵,用上敬下谓之尊贤》,我们特录部分文字如下:

(破题)上与下各有所敬,明其所谓而已。

(承题)夫下之敬上,敬其贵;上之敬下,敬其贤也。明其所谓,不各有当敬者在哉?

(起讲)且论友者至天子友匹夫,几疑敬之用于天子者,略乎上下之分矣。顾惟略上下之分而上下之分愈明,明其为上为下而敬之宜用者,乃相因而并见殊事,合敬而不混所施,固有主名之可按也。如不挂贵之右,皆用上敬下者也。再观上下之际而得其说矣。

(起股)世主骄矜富贵,其福威之擅,几无以折豪杰之心思,然天泽之辨,民志定焉,固忱恂之将敬,不在势权,而在名分;策士游说纵横,而道德之儒转不足动当途之物色,然名世之主,世运系焉,故旁求之雅敬,不在文貌,而在诚心。

(中股)然则用下敬上,敬其贵焉而已,……。

(后股)然而敬之在上,非谓显荣赫奕足以震铄乎一时,而用其敬以售希荣之术也。……。

(收结)故曰贵贵尊贤,其义一也。

文章围绕破题反复论证,有内容,有文采,有气势,典雅,我们今天读来也觉得有特别的韵味。此文本房加批:谢朝华于已披,启夕秀于未振,清真雅正,先正典型于斯未坠<sup>[3]</sup>(册11,第143,146页)。这是很高的评价了,像这样的批语在硃卷中很常见。咸丰己未科马传煦会试硃卷,大总裁沈批:理真词切;大总裁成批:气静神恬;本房总批:第一场近情切理,纯粹以精……。《色难有事》聚奎堂原批:法密机圆,意真语挚……<sup>[3]</sup>(册21,第11,16页)。同治戊辰科林祖述会试硃卷大总裁继批:气静神恬;大总裁文批:义精词卓。本房原荐批第一场:文洁体清,修短合度,……。《君子未有不如此而蚤有誉天下者也》,本房加批:理脉清真,机神动荡,一种英迈之气,尤足辟易于人<sup>[3]</sup>(册29,第47,56页)。

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在清代科举考试中,主考官阅卷正是依据“清真雅正”这一标准来判定文章的等第。然而,在具体操作过程中,由于不同考官才学水平的高低、基本合格试卷水平的微弱差距等主客观原因,都会降低这一标准的准确度,以至于部分佳卷存在被黜落的可能。尽管此标准有无法避免的如此缺陷,但它还是有效地履行了基本的淘汰功能,最大程度地把那些不合格试卷淘汰了出去。遴选出来的合格试卷,其等第的高下还是做到了基本公正合理。因为,按科举考试判卷程序规定,各房所呈之卷,需由几位考官按衡文标准来共同斟酌决定去取,非完全由一位主考官按自己的好恶而成定评,这就极大地避免了衡文的误差,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终极择优功能的不足。如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四月谕中已明确规定:“嗣后顺天乡试及会试正副考官,务当将各房呈荐之卷共同批阅,庶不至以一人意见,遂为定评,以致佳卷或有黜落,而文理平庸者侥幸。”<sup>[4]</sup>(第91页)在硃卷中,考官共同批阅文章的批语为此作了很好的诠释。

## 二

众所周知,八股取士自明代开始,明历代中央政府对科考八股文有许多格式限定。清承明制。然而,有清一代八股文衡文以其一以贯之的“清真雅正”之严格规定,异于明代八股衡文而呈现出自己的特色。那么,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就是:清统治者为何一定要强调科考文章写得“清真雅正”?在此,我们想从清王朝的文化政策以及当时的文风来理解。

清初,当满人以异族入主中原时,曾引起汉族士民的普遍反抗,直到康熙中期,才将大规模的反清斗争平息下去。然而,清初蓬勃发展的实学思潮和广大知识分子的不合作态度,使满清统治者清楚认识到,要在中国建立长治久安的统治,不光要武功,还要文治。统治者深知,要博取民众的信任和强化自己的政治统治,最为重要的是:必须确立一种价值观念和思想学说。

满洲贵族统治者面对的是以儒学为主体的封建文化高度发展的汉族。在本民族相对落后的民族传统和汉族较为发达的封建文化间如何取舍,统治阶级内部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在对几种学说进行比较后,康熙帝选择儒学尤其是程朱理学作为官方哲学和统治思想,以表明自己的统治与历代王朝在政治思想上的一致性和连续性,因而也就具有正统性。康熙不光在口号上宣扬尊孔崇儒,在行动上也表现出最大的诚意,从而赢得了全体汉民的充分信任,大清王朝也逐渐被默认为正统。这样,儒学也就成为了满汉民族共同的文化信仰,满汉民族间意识形态的界限逐渐消除,文化上的凝聚力和认同感得到了进一步加强。

选拔什么样的人参与国家政权管理,这关系到国家的长治久安。满清统治者深知,儒学特别是程朱

理学最适于培养、选拔能“明天理、灭人欲”、处事以“公”代“私”，贵“义”贱“利”的统治人才的需要，也十分有利于维护整个王朝的思想统治。为了将广大的读书人引导到儒家思想上来，使儒家思想更有效地深入人心，满清统治者沿袭元、明科目取士旧制，采用八股取士之制，并将考试内容规定为儒家的《四书》、《五经》，以程朱理学作为士子解经立说的标准。士子解经立说不得越雷池半步，否则，就是离经叛道。此时，作为阶级统治工具、政治思想喉舌的八股文章，其作用体现在：一是宣扬传播统治阶级的统治思想，二是可以规范、统一思想，有效化导民风、士习。满清统治者深谙此理，康熙说：“文章以发挥义理，关系世道为贵，骚人词客，不过技艺之末，非朕之所贵也。”<sup>[1]</sup>（第572页）康熙强调文章应该阐发统治思想，关心现实政治，有补于世道。雍正十年（1732年）谕：“制科以《四书》文取士，所以规士子实学，且和其声以鸣国家之盛也。语云：‘言为心声。’文章之道，与政治通，所关巨矣。”<sup>[2]</sup>（第1649页）乾隆进一步强调文章对正人心厚风俗、规范士民思想行为的作用，谓：“国家以经义取士，将使士子沉潜于《四子》、《五经》之书，含英咀华，抒发文采，因以规学历之浅深与器识之淳薄。而风会所趋，即有关于气运。”<sup>[3]</sup>（第1653页）。

### 三

令满清统治者深感忧虑的是，明末文体杂乱：芜蔓繁冗，放肆佻巧；思想散乱：纵横怪异，奇谈怪论。《明史·选举志一》云：

万历十五年，礼部言：“唐文初尚靡丽而士趋浮薄，宋文初尚钩棘而人习险譎。国初举业有用《六经》语者，其后引《左传》、《国语》矣，又引《史记》、《汉书》矣。《史记》穷而用“六子”，“六子”穷而用百家，甚至佛经、《道藏》摘而用之，流弊安穷。弘治、正德、嘉靖初年，中式文字纯正典雅。宜选其尤者，刊布学宫，俾知趋向。”因取中式文字110余篇，奏请刊布以为准则。时方崇尚新奇，厌薄先民矩矱，以士子所好为趋，不遵上指也。启、禎之间，文体益变，以出入经史百氏为高，而恣肆者亦多矣。虽数申诡异险僻之禁，势重难返，卒不能从。论者以明举业文字比唐人之诗，国初比初唐，成、弘、正、嘉比盛唐，隆、万比中唐，启禎比晚唐云。

明礼部把明举业文字与晚唐诗相比，足见其在明末颓靡之一斑。入清后，明末遗留的这种浮靡文风多遭到非议，同时，又因其中夹杂不少与封建正统思想相悖离的“奇谈怪论”，更为统治者不容。清初统治者对此种文风有比较清醒的认识，同时也注意到文风与政治统治的唇齿关系。雍正十三年（1735年）十月谕云：“朕思学者修辞立诚，言期有物，必理为布帛菽粟之理，文为布帛菽粟之文，而后可以垂世行久。……国家累治重熙之日，务学绩文者，正宜沐浴教化，争自濯磨，蘄近于大雅，勿尚浮靡，勿取姿媚，斯于人心风俗有所裨益。”<sup>[2]</sup>（第1652页）雍正用比喻来阐述为文对辞、理的要求，只有纯粹、朴实的文风才有裨益于人心风俗，空虚、浮华的文风无益于世道人心。统一思想，端正人心，淳厚风俗正是清初统治者的一项重要文治政策。学风、士风的好坏直接关系到统治阶级队伍素质的高低和统治基础的稳定与否。为维护政治统治，有清一代各朝皇帝都极力厘正八股文体，以“清真雅正”来矫正浮靡的八股文风，借以振刷学风、士习，为封建统治者稽古右文、施行文治创造良好的条件。

顺治二年（1645年）规定：“文有正体，凡篇内字句，务求典雅醇粹，不许故摭一家言饰为宏博。”<sup>[6]</sup>（第303页）顺治六年（1649年）殿试，又明令取消明末以来对策使用四六骈体的陋习，目的是推行质朴的文风。八年（1651年）题准：“学政岁科考，各分四次解卷到部，会同礼科磨勘，所取生童文字，以纯正典雅为主。”<sup>[6]</sup>（第303页）顺治帝虽没有明确提出“清真雅正”这一概念，但是，这些规定对转变明末文风，使之归于朴实纯粹起到了很大作用。康熙强调“文章贵于简，当可施诸日用。如奏章之类，亦须简明简要”，“讲章辞取于达意，以确切明晰为尚，……务去陈言”<sup>[7]</sup>（第187、194页）。且多次训饬士子，要求他们“躬修实践，砥砺廉隅；敦孝顺以事亲，秉忠贞以立志；穷经考义勿杂荒诞之谈；取友亲师悉化骄盈之气；文章归王醇雅，毋事浮华；执度式于规矩，毋防茫昧”<sup>[8]</sup>（第116页）。康熙的主张，为后来“清真雅正”的提出作

了很好铺垫。到雍正时,“文风丕变,但士子逞其才气辞华,不免有冗长浮靡之习”,所以雍正晓谕考官,“所拔之文,务令清真雅正,理法兼备。虽尺幅不拘一律,而枝蔓浮夸之言所当屏去”<sup>[9]</sup>(第 152 页)。在此,关于衡文的宗旨已经明确提出,那就是“清真雅正”。乾隆三年(1738 年)再次强调“岁科两试以及乡会衡文务取‘清真雅正’”<sup>[10]</sup>(第 206 页)。乾隆看到“士子率多因陋就简,剽窃陈言,雷同肤廓”之病,因而令方苞选编《钦定四书文》作为士子学习的典范,这也就把清初八九十年的衡文风气归纳起来,并明白规定了下来。乾隆后来还强调:“场屋制艺,屡以‘清真雅正’为训,前命方苞选录《四书文》颁行,皆取典重正大,足为时文程式,士子咸当知所崇尚矣,而浮浅之士,竞尚新奇……不惟文体卑靡,将使心术佻薄,所关于士习者甚大。朕曩云‘言孔孟言大是难’,职是故也。著将《钦定四书文》一部,交礼部顺天府存贮内帘,令试官知衡文正鹄。”<sup>[12]</sup>(第 1661 页)朝廷的这些干预,对转变明末的八股文风起了一定的作用,像顺治朝的刘子壮、熊伯龙、张玉书,他们为文雄浑博大,力求拯救八股文于颓靡衰败之中。康熙以后,八股文风走上了雅正之路,韩荃、李光地积极提倡这种文风,成为“清真雅正”的开路人。桐城派方苞以古文为时文,所写时文成为士子模仿的典范。雍正、乾隆年间,八股作家辈出,八股文法也日益精密完备。

到了晚清,考官衡文选士仍以“清真雅正”为基本准绳。尽管科考文章有此之训,但这无法遏制住文章颓靡之风。为求文章能在千篇一律之中博得考官的青睐,士子应试竞尚丽辞以耀试官之目。晚清八股之弊约而有四:“一为尤王派之弊(王,指王广心,字伊人,号农山),以辞藻为制义,二为雷同之弊,三为文陋之弊,四为截搭题之弊。”<sup>[11]</sup>(第 217, 218 页)同治帝已觉察此弊,谓:“近年以来科场或抄袭肤词,或抄录旧文,于士习文风大有关系。”为正文体,于同治十一年(1872 年)明谕考官:“衡文务当认真校阅,以‘清真雅正’为宗。”<sup>[9]</sup>(第 305 页)甚至在 1901 年八股文被宣布废止后,评价师范生作文的标准却无多大变化。1904 年颁发的《初级师范学堂章程》规定:“师范生作文题目大小篇幅长短不拘,当以‘清真雅正’为主。”<sup>[12]</sup>(第 281, 282 页)正如张之洞在其改革方案中所说,“八股之格式虽变,而衡文之宗旨仍以‘清真雅正’之圣训相符”<sup>[13]</sup>(第 3403 页)。

综上所述,有清一代八股文衡文的标准乃“清真雅正”。它是清初统治者鉴于明末科举考试遗留下来的浮靡文风,同时为配合稽古右文、文治政策的施行而在考试士子时提出的。此标准也为满清后来各王朝所沿袭并得到强化,对统治者选拔人才起了相当的作用,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人治”时代人才甄选活动的随意性,有效保证了选拔的公正性、客观性。按八股考试的规定和这一衡文标准,八股文写作要求严格地以朱注《四书》为准绳,朴实典雅地阐发儒家之学、程朱之道,最为关键的是要符合封建统治者要求的“正统”二字。然而,也就是这些思想内容和结构程式上的苛刻要求,致使这一文体趋于僵化,终因不能胜任历史发展的要求而消逝了。

### [参 考 文 献]

- [1] 赵尔巽. 清史稿[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7.
- [2] 托 津, 等. 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嘉庆朝)[Z]. 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 第 67 辑[C]. 台北: 文海出版社, 1992.
- [3] 顾廷龙. 清代硃卷集成[C]. 台北: 成文出版社, 1992.
- [4] 庆 桂, 董 诰, 等. 高宗纯皇帝实录(十九)[A]. 清实录[Z]. 北京: 中华书局, 1986.
- [5] 张廷玉, 等. 圣祖仁皇帝实录(一)[A]. 清实录[Z]. 北京: 中华书局, 1985.
- [6] 昆 冈, 等. 清会典事例: 第 5 册[Z]. 北京: 中华书局, 1991.
- [7] 张廷玉, 等. 圣祖仁皇帝实录(二)[A]. 清实录[Z]. 北京: 中华书局, 1985.
- [8] 张廷玉, 等. 圣祖仁皇帝实录(三)[A]. 清实录[Z]. 北京: 中华书局, 1985.
- [9] 王燕绪, 等. 世宗宪皇帝圣训[A]. 钦定四库全书: 第 412 册[Z]. 台北: 商务印书馆, 1986.
- [10] 王燕绪, 等. 钦定大清会典则例[A]. 钦定四库全书: 第 622 册[Z]. 台北: 商务印书馆, 1986.
- [11] 卢 前. 八股文小史[A]. 刘麟生. 中国骈文史[M]. 北京: 东方出版社, 1996.
- [12] 张之洞. 奏定学堂章程. 初级师范学堂章程[A]. 沈云龙. 近代中国史料丛刊: 第 73 辑[Z]. 台北: 文海出版社,

1973.

- [ 13] 张之洞. 张文襄公(之洞)全集(奏议)[ A]. 王树楠. 近代中国史料丛刊: 第46辑[ Z]. 台北: 文海出版社, 1973.
- [ 14] 梁章钜. 制义丛话[ M]. 上海: 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1.
- [ 15] 李元春. 青照堂丛书·四书文法摘要[ Z]. 朝邑刘氏, 清道光刻本(上海图书馆藏).
- [ 16] 方 苞. 钦定四书文·凡例[ A]. 钦定四库全书[ Z]. 台北: 商务印书馆, 1986.

(责任编辑 何坤翁)

## **Qing' s Cultural Policy Influencing upon the Marking Criterion of the Eight-part Essay**

**GAO Ming-yang<sup>1</sup>, JIANG Jin-xing<sup>2</sup>**

(1. School of Humanities,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28, Zhejiang, China;

2. Faculty of Literature and News Communication, Xiangtan University, Xiangtan 411105, Hunan, China)

**Biographies:** GAO Ming-yang (1970-), male, Doctoral candidate, Research Institute for Ancient Books of Zhejiang University, majoring in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system from Ming to Qing Dynasties; JIANG Jin-xing (1968-), male, Doctor, Lecturer, Faculty of Literature and News Communication, Xiangtan University, majoring in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system from Ming to Qing Dynasties.

**Abstract:** “QingZhengYaZheng” is the marking criterion for the Eight-part Essay of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in Qing Dynasty. The author analyses it' s specific meaning, “qingzhen” are aimed at “Li”, “yazheng” are aimed at the language. The marking criterion is inflexible and flexible. It has the selecting function. The marking criterion relates to the style of writing of the times. Its establishment is not only the interior requirements for the Eight-part Essay, but the ruling class put forward that for carrying on the cultural policy in consideration of the malady of the style in late Ming Dynasty. This reflect the talent conception of the government. It goes through Kangxi and Yongzheng Dynasties. Till Qianlong Dynasty, it has been fixed definitely, followed and consolidated by the later dynasty.

**Key words:** Eight-part Essay; marking criterion; Qing Zheng Ya Zheng; cultural policy